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是我们党一切事业成败的关键

市政协副主席 肖克和

(2014年3月26日)

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天这个大讲堂要我来讲第一课，让我感到非常荣幸。不管是党的群众路线学习也好、实践也好，都还做得不够。所以由我第一个讲是委屈了同志们。今天我讲的内容主要是一些个人的工作经历，有一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但是放良主席交给我这个任务，大家都要讲，所以就鼓起胆量向大家汇报在群众路线的学习、实践的一些收获、一些体会。讲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同志们能够包容。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事业成败的关键》。

围绕这个课题我向大家汇报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我本人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学习和认识；第二个是结合工作浅谈践行群众路线的体会。

第一个是关于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学习和认识。按照学习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最近一段时间较为集中时间和精力，学习了中央规定的三本书和我们市委规定的一本书，围绕一些理论的问题并结合自己实践经验进行了深入思考，通过学习思考，自己在群众路线这个问

题上得到了这么三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个是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就是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我们党的主张变为群众的自主行动，这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概括性的三个方面。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方法；把我们党的主张变为群众的自主行动，是我们党推动全部工作的目标，所以群众路线的三句话实际上概括了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方法、目标。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认识。

第二点认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看家本领，也就是我们党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创建了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所以历届党的领导人都是靠群众路线起家，把群众路线作为我们党工作的看家本领。小平同志曾经讲：“毛泽东同志的作风最基本的就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当时就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毛

主席参透了群众路线,可以说他一生实践了群众路线。比如说他在革命时期,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典型的深入乡村、深入农民,通过认真调查得出的结论。毛主席在建设时期认为我们党对中国革命打仗很有启发、很有经验,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刚刚解放以后,应该说非常陌生。毛主席带头搞调查研究,做过好多典型的实践,比如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农业发展40条》。《农业40条》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性指导文件,并且使我们50年代末中国农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靠的就是40条的指导。但同志们,毛主席的40条的制定至少是找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多次召开座谈会。比如1958、1959年时毛主席几次回湖南,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农业40条的制定,专门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和群众的意见。比如说毛主席讲的农业纲要是800斤,毛主席讲:“有些同志主张1200斤,有些同志讲500斤,大家讲我们搞制定纲要到底要多少?”我们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岳阳地委书记王志国、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他们这些县委书记还有一批,大家就讲“主席,1200斤我们目前很难做到,现在我们粮食只有300斤、400斤”。然后一些县委书记就讲“如果要推行双季稻、推行良种良法,粮食可以达到800斤”。所以毛主席就讲“按照大家的意见,我们推行良种良法、推行双季稻,我们搞800斤要得不?”大家就讲要得。还有毛主席深入到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参加的关于四害的座谈会,毛主席讲苍蝇要不要消

灭,大家就讲苍蝇滋生地分室内和野外,室内要消灭做得到,野外要消灭做不到。毛主席就讲那我们就提“基本消灭苍蝇”。血吸虫,大家讲到血吸虫就异口同声地愤慨,贻害了我们中国农民几千年,毛主席就讲那这个我们就一定要彻底消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毛主席问“这个狗还打不打呢?”周小舟、华国锋讲:“主席,这个狗有两个方面,第一咬人,第二呢,它能够看家护院,同时肉还能吃,”毛主席就讲:“那我们就不打狗了。”所以实际上毛主席制定农业40条的时候是典型的走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还有我们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大家知道,我们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从农业土地承包制搞起,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始做起,典型的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依靠群众。改革开放几十年,每个时期的改革创新行动的实践都是靠群众路线来推动、来决策。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也好,胡锦涛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也好,都是典型的体现党的群众路线。这是我讲的第二点体会,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看家本领。

第三点认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首先从政治局常委带头学习群众路线,然后开展八条禁令,再开展反四风,再加大反腐的力度。一年的时间以来,讲的是群众路线,做的是群众路线,得到了绝大全党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特别

是反四风、践行群众路线,实行八条禁令以及省里湘潭的九条禁令,我们的党风、政风、民风明显的根本好转,人民群众一致拥护。许多农村基层老共产党员讲,看来我们共产党有希望。所以我们只要坚持群众路线,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所以一年以来,新一届的党中央把群众路线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措施是非常正确的。这是我跟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回顾的第一点的认识,关于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和理解。

我要向同志们回顾的第二点,就是践行群众路线的体会。大家知道,我从生产队的出纳保管员做起到今天有40多年的时间了,可以说对群众路线方面,越是基层干部出身,越只能从这个方面去努力,所以对群众路线方面确实有点体会,也做了一些群众路线可以概括的事情。回顾自己多年来的工作实践,对群众路线方面主要有六个方面的体会:

第一个体会,确立全局工作的指导思想,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变为群众无穷的力量。你在单位当一把手,必须确立一段时间的工作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怎么确立,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听群众的意见。了解这个地方有了什么?需要什么?还缺什么?群众是怎么想的?应该怎么干?才能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使确立的指导思想你走了以后也不会变,这样子才是正确的指导思想。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

部请教,然后再发命令。”这是毛主席践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一个名言。结合我在工作实践中也先后在一些单位提过一些东西。我记得有几个地方:第一个是1990年到湘乡当教育局长。同志们,那个时候我是长期搞农村工作的干部,在东郊乡当过团委书记、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东郊区区长、于塘乡书记,所以要我去当教育局长,当时湘乡教育界和湘乡市大家都替我捏一把汗,你这个农村农民干部怎么能去领导知识分子呢?但是当时的湘乡市委刘光辉同志当市委书记,就偏偏这么决定我当教育局长。因为当时湘乡教育局呢,在座的领导都晓得,长期告状,告到李铁映、李鹏哪里,告到中央好多部门,一批教师长期占用教育局长办公室,搞得湘乡市委伤透了脑筋。所以市委就来个创新,搞个农村干部当教育局长看看,所以让我也去当教育局长。去了以后怎么入手,我觉得靠的就是群众路线。先后找了一批学校、找了一些校长、找了一批离退休教师、找了一些群众代表,也找了社会上的一些人民代表,你们对教育怎么看?然后通过几十次座谈会和调研走访以后,我就在湘乡教育局教研室谈对教育的观点。我认为一个地方的教育部门,教研室是非常重要的,都是来自各个学校的有名的教师、有影响的教师。通过调研以后,心里有点底了,我就偏偏在教研室谈自己的观点。我记得那个时候谈到以后我们湘乡的教育指导思想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教育教学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抓常规教学管理,一手抓教

育教学改革。这个我还给他们解释,我说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我们的教育围绕党的基本路线的实现我们就以教育教学为中心。讲了这个指导思想以后,当天晚上在湘乡城区就传开了,大家一致拥护。大家讲我们湘乡教育局几任局长了,从来没有哪个教育局长说要以教育教学为中心,这个区委书记要以教育教学为中心,并且他还晓得要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常规教学管理,讲到了教研室同志的心坎上。他们就这样一传十传百,传到了人大主任李受芹那里,他马上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今天的讲话产生了爆炸性的效应,很好,教师拥护。结果在我那几年就坚持了这几点,确实对湘乡教育质量的提升,对教育管理的加强,对教育的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以现在湘乡教育界说对我还有好多留恋。这是一个体会。

第二个就是我在湘潭县当县长的時候提出了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主攻工业、提升农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个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的提出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也经过了我在湘潭县前几年的认真思考和实践。因为湘潭县是毛主席家乡,长期以来就是以粮食为纲,粮食产量很不错,但是一个农业大县却变成了一个财政贫县,我当县长时湘潭县的财政总收入是1.52个亿,严重的不敷出,所以湘潭县要发展必须搞工业。所以我就通过在制定十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了主攻工业,但是当时提出的指导思想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有严重的分歧。于是我就召开了一次

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加的座谈会,请工业界和农业界的委员代表,大家一起来协商讨论。他们下面发言的时候,农业界的委员强调要搞农业,工业界的委员强调要主攻工业。最后他们骂起来了。农业界的骂工业界的:“你这个畜生,赚了钱没有饭吃你怎么搞?”工业界的骂农业界的:“你是个猪咧,有了饭吃没有钱用怎么搞?”争起来了,最后我们以大量的事实反复讲,我们主攻工业并不意味着放弃农业,反而提升农业;我们提升农业,也并不意味着不搞工业,我们主攻工业,就是工业、农业一起上,同时通过工业的发展来反哺农业,通过工业的发展挣了钱来减轻农民的负担。所以他们觉得有点道理,就结束了。最后在湘潭县人民代表大会,我围绕这个主题做了一个报告,湘潭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就我们这个思路做个决定,我现在记得湘潭县人民代表大会第十届四次会议《关于主攻工业、提升农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工作思路的决定》,大家非常支持这个决定,领导也全力支持。所以后来湘潭县不到几年的时间,易俗河工业的发展非常快。后来我走了以后,陈忠红书记他们都说主攻工业、提升农业这个思路很对,一直到现在湘潭县主攻工业的思路都不变。当时我在的时候效果不太明显,后来走了以后一年一个番发展比较快,可以说就是靠的工业。我当城管局局长的时候也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执法局是我一手创立的。当时对城管执法群众意见很多,经常打人、经常处罚决定不按程序来,没有处罚文书,通过我们反复调研听取下面的

意见后,就作出了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文明执法、为民执法的执法理念,创造了一个行政执法的局文化,一直坚持到现在,也就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听取群众的意见,提出这么一个指导思想。我在高新区兼岳塘区委书记的时候,当时岳塘区的同志非常渺茫,要从岳塘区划两个乡镇到高新区,我兼高新区书记大家又做不得声,情绪很大,我通过座谈、调研,反复听取群众意见后,在岳塘区提出了优先发展三产业,转型发展二产业,统筹发展一产业的思路,然后把岳塘区的经济发展确立为“三圈五带”。开了一天的常委会,大家讨论、商议,最后我提了这么一个观点,提了这么一个思路,然后在常委会我讲话后,全体常委鼓掌,我就感觉到岳塘区高新区区域调整的阻力应该不是很大了。然后第二天开了一个全区的千人干部大会,发表一个讲话,就是思想统一,提了这么一个思路。就是重点搞三产业,搞三产业是搞地税,搞三产业是搞质量,搞三产业是搞效益。所以岳塘区的干部2010年每个还加了几百的绩效工资,待遇还高了一点,所以大家非常高兴。所以一个地方要提出一个指导思想,要作出一个全局性的规划,你要制定这个东西可以,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才能够变为群众的自主行动,才能够得到发展。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点体会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必须坚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坚持面对面,这样才能处理好。毛主席曾经说过:“所谓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经常讲的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与群众商量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要脱离群众。”毛主席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也就是靠群众路线,与群众商量,这是真理,在我的实践中真的得到了验证。今天我给同志们回顾这三个事例:第一个湘潭县荷塘村信访问题的处理。那是我刚刚当县长不久,湘潭县的中路铺荷塘村的一个律师叫马建强,他长期告支部书记齐光明,一直告到朱镕基总理、江泽民总书记,时间先后告了七年,多年列为湖南政法委信访办督办案件,湘潭县多次派政法委书记、副书记、信访办主任去处理,乡镇书记先后多次上门,反正是县里乡镇的干部去了以后不能走,车子扣起,去一个就扣个。后来我当县长以后,感觉到信访是一件大事,我说我们开个会带头处理信访案件,荷塘村的信访案件我来处理。我就带着政府办的主任就去处理荷塘村的信访问题。我去呢,先不是到支部书记家里去,也不是到村干部家里去,就是到这个告状的马建强家里去,开着车子到他坪里。然后问他“你贵姓,姓马吗?”他说:“是的”,我问“是马建强吗?”他说:“我是马建强,你是哪个?”我讲:“我是湘潭县的县长我叫肖克和,“啊!肖县长,你来了。”“我说:“今天在你屋里恰中饭,你告状告了格多年了,今天好好听你的意见。听说你呢,来的车就扣车,来了人就扣人。今天本县长来了,你车也不用扣,饭到你屋里吃,晚上在你屋里困,”他说:“肖县长你来了,还用说,”马上喊他堂客:“堂客快来,肖县长来了,”然后搬

楼梯上楼取腊肉,吃了饭以后我就正儿八经听了他4个小时的讲话,到了后面我就讲:“今天是听你的意见,我任何问题就不能作结论,要到你们村里面好好调查研究,然后再和你们村里面的党员群众代表评论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误的。对的我们就接受,你的错的就你放弃。”他讲:“要得,肖县长如果这样搞我横直要的。”我就真的在村上到处走访,又找支部书记谈话,又找村干部谈话,然后让政府办主任告诉县农经局对村里的财务进行了全面的审计,通过审计座谈后发现了村上的66个问题,66个问题怎么处理,我就同马建强商量,我说:“你的信访问题全部查清了,究竟怎么做结论,我今天还不表态。明天我们开党员群众代表会,大家来表决。”他说:“要得,我同意这个意见,”我就把村里党委、群众代表一起40多个人全部叫齐,把66个问题调查了什么,我们县里面提出的处理意见,大家同意处理意见的请举手,不同意的就不举手。一定要少数服从多数,超过半数这个意见就通过了。首先讲清楚方法,大家都同意。在调查的过程中,这个村提了很多的意见。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去了一个礼拜后,当时的围墙上挂着一条横幅,标题是“热烈欢迎肖县长来我村指导工作”,当时我看了标语以后就觉得有希望了,群众向我们靠拢了。所以党员代表座谈会上,我们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通过了,就只有一个问题没有通过,什么问题呢?就是湘潭县人大的一个老领导,帮这个村先后搞了几万元钱,这个村上就送了一些花生、西瓜、鱼嫩子、茶油

等,共400元钱,这个马建强告的内容也把这包括在内,我讲送湘潭县人大领导人情的事经过调查属实,我本人认为马建强没有告错,确实送了,村里不要送人情,但是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我说这300、400元钱不要你们出我来出,你们放心。最后一个老党员站起来,“肖县长,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当时以为他反对我的意见,他说:“我们这个村穷的要血,人家一个领导给我们搞几万块钱来了,我们送点花生、鱼嫩子、茶叶,有什么了不起,马建强怎么还将这个问题去告了?不要肖县长出,我们村民大家出,我们党员出。”最后大家一致不同意这个意见,不要我出,搞得马建强面瑟瑟的。所以整个66个问题,有几个问题,支部书记要退1000多块钱,当着我的面把钱退了。群众满意,马建强也满意。最后我们县里面又组织相关的部门委局、财政局开个现场办公会,投入30、40万把水利设施建设好,所有的建设搞好,彻底解决了这个村的问题。现在这个村是湖南省的先进党支部、先进村,所以这是一个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湘潭县晓南事件,老同志都知道,当时有一个叫杨志明的,他们家欠340元钱,法院决定强制执行,由县公安局法警大队去执行法院的决定,在执行的过程中发生了口角,一棍子把杨志明的儿子打死了。同志们,矛盾本来就对立,为了执法把人打死了,当时杨志明家里及当地的群众就借题发挥,造成附近10多村,5000多人围着这个地方,干部去处理问题,把干部

扣起来,关了几天几夜。然后来了几百人到市里上访,把市委堵得水泄不通,然后公安局派武警应对,搞了半个月,最后一直没有得到处理。没有办法了,当时市委书记卞翠平、蒋建国市长提出“这个问题要处理好,有哪个同志敢到他家里去不?”当时我是湘潭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当时我就说我去,我一个人去就是了,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最后蒋建国市长说:“克和,你要注意安全啊。”我说:“没事。”当时,我开着车子一个人到杨志明家里,我说:“杨老馆,我今天就到你家里睡,你先给我打盆水洗脸、洗脚,有事明天再说。”然后他真的给我打了盆水洗脸、洗脚。我说:“我就睡在你死的这个儿子的床上,”我在这张床上睡了三夜。第二天清早,杨志明的老婆打着洗脸水拿着新毛巾到房间里来了,他媳妇就端了甜酒冲蛋进来了。我心里就高兴得要死,至少到他家里安全了。吃饭以后,我就和杨志明说,“杨老馆,我今天是听一下你的意见,你要好好想想你儿子的事情到底怎么处理,天上的人死了,地上的人要散,你下午再和我说,我再来听取你的意见。”然后我就在这个村里进家家户户,我自己花钱买了几包白沙烟,买了几包槟榔,听他们的意见,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处理,听了好多意见、群众的意见就是一条:赔偿,没有别的意见。后来一边听取意见,一边解决村里面提出的一些问题,集中精力搞水利建设,分散群众注意力。最后这个杨志明就同意这个事情依照赔偿法通过赔偿,我们就把晓南的赔偿标准提高到易俗河的标准,赔 25.2

万元钱。把这个钱送到他那里以后村里面也同意了,就没有人说话了。事后我就找了杨志明:“杨老馆,还有一个事你没有想到,”“还有什么事呢?”“你知道继承法吗?你儿子死了,赔的钱,继承人是你媳妇,还有孙子,都放在媳妇那里,但是赔偿的范围是父母、老婆、子女三个范围赔偿的,你现在如果说把钱给了媳妇,你媳妇现在才 20 多岁,打了这个条子,把孙子丢给你,带着钱存折走了,嫁人了,到时候你去找谁,杨志明一拍大腿说:“真的是啦,肖县长,你怎么想得这么周到呢?我硬是没有想到这个事。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你到法院去,25.2 万,媳妇多少?孙子多少?你们两口子多少?分三个存折存款,要法院出个文书搞清楚。”最后老老实实,马上开始算,父母多少、媳妇多少、孙子多少,三本存折,然后我要他和他媳妇讲,媳妇的给媳妇,父母的给父母,孙子的给父母拿着,媳妇要是嫁人孙子的部分放在父母这里,媳妇不嫁人孙子的部分就给媳妇,这样子就可以了。算了以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媳妇是衡阳的回到衡阳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嫁人了。所以晓南村的干部群众对我的第一个决定他们觉得还不怎么样,对我的第二个决定他们就佩服得到五体投地,认为我这个人真的是为他们着想。所以后来我 2003 年受伤以后,在湘潭县中医院住院,这个村的 1000 多个群众都想来看我。结果他们想,肖县长住在医院,不能过多的人去打搅。于是他们村杀了 2 只母鸡,把毛拔掉,把内脏拿掉,送到青山桥镇书记宋小玲那里,代表他们村

的村民将这两只母鸡送到我病房。所以同志们，我们干任何事都要为群众着想。群众想到的你也要想到，群众没有想到的，你同样要为他想到，这样我们当干部才能得到人们的拥护。还有一个盐铺事件。有一个叫王湘林的，镇上到他家里要 100 多元钱上交，与王湘林发生争执，结果他一气之下得脑溢血死了，当天周围的人叫把花石镇朱副镇长在王湘林床前一直跪着 5 个多小时，群众就看热闹。朱镇长跪在死了的王祥林床前，2000 多群众挤在这个木板房前随时有倒塌的危险。那时我在易俗河，打电话告诉我，然后去处理，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带了 200 多干警去处理，夜里也很黑，我说干警不要进现场，在一公里以外听候命令，让我一个人先去，我去了以后就找群众座谈，面对面的听取他们的意见。一个同志就讲肖书记来了，听肖书记讲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就选取 5 个代表开座谈会，我就说我的意见，当时讲的时候窗户前群众都在听到底肖书记怎么讲，我就讲了我的意见，讲了 5 点，他们听了前 3 条，讲到 4 条，群众就不听了走了，去做什么呢，到床前把花石镇副镇长解救出来，要在外面的干部将他送回去。当这 5 条讲完，他们就讲：“肖书记，你讲的这前三条就可以了，我们完全同意，完全赞成，完全认可。所以朱镇长你也不用看了，已经送他回去了，”只要跪在床前的朱镇长送走了就什么事解决了。将朱镇长送走以后，群众就撤退，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只剩了几个人，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我说你们就不用来

了，赶快回去。所以处理这个突发事情，靠的是一切为群众着想，靠的是面对面，靠的是深入到一线，靠的是务实，为民着想，换位思考，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是我谈的第二点体会。

第三点体会，是对影响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人和事，必须做好工作、果断处置，这也是群众路线走的好不好的表现。小平同志说过：“群众意见无外乎也是这么几个情况，有的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就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些是部分合理的，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做好工作，进行说服。”这是小平同志对群众意见三种情况区分后处理方法。所以有的事情明显就不对，就是损害绝大多数根本利益的，偏偏又棘手的事情怎么办？我体会最深的一个是湘潭县易俗河 23 路公交车的开通。我是 1997 年 9 月 6 日到湘潭县去当县委副书记兼开发区的主任，易俗河的群众就讲，首先你当主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通公交车，后来我就问其他同志，其他同志讲安排了 23 路开了四次，群众期盼开，就是开不进来。我就讲：“既然群众要求的事情就要赶快做，就要敢于做，可以放肆做。”我们就发出公告，23 路车要开通。我记得是 1998 年 3 月 20 日开通。当时我就带了公安局的、管委会的在县水利局做指挥部，迎接 23 路车过来，县公安局副局长唐放鸣组织几十个公安干警到那里集合，我们刚刚坐在那里，23 路车还没有开出，易俗河 40 多台中巴车堵在二大桥，根本就无法开进来。最后唐放

鸣就向我报告，“肖书记，搞不成器。”“为什么？”“40多台中巴车堵着，根本开不进来。”我当时想，公交车是几十万人的需要，40多台中巴车只是为了私人赚钱，绝对是小部分人的利益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矛盾问题，这个事情我们如果放弃，就是迁就了小部分人的利益，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我马上决定公安交警的同志上来，上来之后一个圆桌会议，我当即就发布命令，我说这样的，40多台车你们不要管，请你们的所有公安干警跟我去，手牵手把一台中巴车围起来，然后交警把你们的拖车带过来，你们放出一个口子，让交警把这台车拖走，看谁敢阻拦。后来他们真的这样做了。下去没有十分钟，公安干警把一台中巴车手牵手围起来，交警把这台车拖走，刚刚拖走不到两百米，其他中巴车马上调头走了，后来23路车从湘潭市区过来，开到易俗河，老百姓处处放鞭炮迎接23路。何坤布书记、宋厚源县长高兴极了，总算搞通了。所以只要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事，哪怕你就是抓人也应该做，也同样是走群众路线，你不能说走群众路线，群众讲的就都是对的，你要看是什么群众、是多少群众，人家坐中巴车到湘潭市要2元钱，坐公交车只要1元钱，少了一半，绝大多数群众得利。后来我跟管委会的同志说：“只要是绝大多数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做了以后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所以为什么开通23路易俗河的群众会放鞭炮，证明我们拖中巴车拖对了，不拖就散不了。所以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的人和事时，我们要

做好工作，我们一定要果断处置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我回顾的第三点体会。

第四点体会就是想问题、办事情必须坚持从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出发，一切为人民群众着想。你想问题办事情，无论办什么事，无论想什么问题，都要坚持从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出发，要一切为群众着想。列宁同志在1917年曾经说过：“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时时刻刻同人民群众在一起。”所以我在工作的过程中想问题办事情的时候，为群众着想，为群众谋利益应当说有较大的收获。其中几个比较典型的事情：第一个是湘潭县的农业税费改革。湘潭县在60年代、70年代只有86万多亩，韶山灌区开通后增加了10多万亩。所以我们2002年进行税费改革，对农业税重新造册登记的时候，湘潭县从乡镇统计的农业税面积是85万亩，乡镇的同志出发点是好的，就是怕加重人民的负担，怕增加新的纳税面积。后来县财政局长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县长，农业税马上要上报了，乡镇报的是85万亩，780斤，我们到底要报好多？”我当时马上决定说：“90万亩，报800斤，”报到市里以后，打来第一个电话的是陈坤书记，他说：“肖克和，你是农民出身，怎么加重农民的负担呢？农业税为什么要增加5万亩，每亩增加20斤”，“陈书记你放心，农业税马上要取消，中央转移支付，况且我们确实有90万亩，”陈书记问：“你这个消息哪里来的？”什么故事呢？我参加了一个中央召开的县域座谈会，陈锡文亲自主持。座谈会上我作了

个即席发言 35 分钟，把湘潭县财政的困难、欠了 3、4 个亿的苦处做了汇报，现在欠好多？干部、教师发不出工资等问题进行了汇报。汇报以后吃了晚饭，陈锡文秘书就到我房间来，要我把下午的发言整理出一个材料，回去要给朱总理看。后来我们就整理这个材料到凌晨三点，第二天陈锡文又通知我到他房间去坐坐，他讲“你不要急，我们现在马上进入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由中央转移支付，你们财政就会好转。”我就听到心里了，这都是还没有传达的意见，他提前给我提了醒。我就说加 5 万亩，加 20 斤，湘潭县可以增加 2000 多万的转移财政，同时粮食大县的奖励什么都是按 90 万亩算的，从 2004 年一直到现在，有 10 年了，湘潭县多得到了 4 个多亿。所以当时我就是为群众利益着想，所以为群众着想，能够为群众带来实惠。湘潭市的几座大桥的收费，湘潭市的车子每台车每年要交 1000 元钱搞年检年审，由高速公路负责收费，签了合同了，已经登报了，当时正是公路收费改革的时候，2008 年 11 月 18 日，湖南省交通厅要我们赶紧申报湘潭市养路费，公路收费站的债务，朱津渡、如意、河口、七里铺的债务究竟是多少？所以接到通知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将我们 2 座大桥的债务进入国家收费改革的笼子，由中央来负责。（因为一桥二桥属于国道线）当时通知我们下午两点半之前要报数，于是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说我们搞统计的出差了，要下午四点才能赶回来，我们大概五点能报得上。余爱国市长高度重视，把这个债务全部并

到了四座收费站里面，作为公路部门、交通部门、公路收费站的债务上报到了交通部财政部。通过审计维持了 8.5 个亿，实际上只欠 5、6 个亿，所以 8.5 个亿 50%，也就是 4 个多亿，湘潭市财政负担的钱就不多了。后来每一台车年审的 1000 元钱就不要了。当时这项决策为湘潭老百姓争取了 4 个多亿，凭什么呢？凭的是想问题办事情装的是老百姓，为老百姓着想。我们在高新区，项目拆迁，1000 多亩 200 户，40 天的时间征拆掉，为什么那么快，一个是提前扎实，我是把自己的床就放在这个国强村，我们为群众着想，那边搞拆迁，我们搞养老保险。我记得一个 70 多岁的农户，每个月可以拿到 720 元钱，天上掉一个馅饼，安置区的每家每户，我跟硕科同志每户 100 斤米，20 斤茶油，送过去，所以一切为群众的利益考虑这些问题，然后调动了群众配合我们的积极性，所以 40 天时间就完成了，我们在征拆过程中一切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为群众着想，把党的政策及时的送到他们手中让他们享受政策的好处，消除对立情绪。这是想问题、办事情要为群众长远利益着想。这是我的第四点体会。

第五点体会，什么时候坚持人民路线人民就拥护，什么时候抛弃了群众路线人民就反对。在我的一生中体会是最深的。我在湘乡，我记得 1983 年，农业大丰收，在于塘区也好，在教育局当局长也好，我都坚持走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的福利待遇，关心群众的痛苦，所以群众能够拥护你，我当湘乡市副市长是跳票选上来的，当时不晓得，97%的票

当选湘乡市的副市长,靠的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做了工作,得到拥护。在湘潭县坚持群众路线,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做得好,当时我要调离湘潭县,湘潭县 23 个人大常委委员有 18 票不同意我辞职。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坚持群众路线,把事情办好,人民群众才拥护你,不坚持群众路线,人民群众就不拥护你,或反对你。大家都知道我在岳塘区当区委书记,出了个王茜事件,这个事情是我官僚主义,也是区委官僚主义,为什么呢?不搞民主推荐,又不看档案。提拔干部第一个就是看档案,档案不看,推荐也不搞。由于自己不坚持群众路线,由于有官僚主义的这么一个嫌疑,不深入、不扎实,所以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对湘潭的形象造成了影响,对岳塘的形象造成了影响。如果说当时坚持看档案,文凭的问题发现了,工作没有三年的时间发现了,后续的问题就不会发生。因为没有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对湘潭、岳塘造成了影响,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什么时候坚持群众路线人民就拥护,什么时候不坚持群众路线人民就反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工作作风的两个根本点,非常重要。这是讲的第五点体会。

第六点体会,群众路线与“四风”是水火不相容的。江泽民同志在他的关于群众路线论述中曾说过:“我看对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狠抓一下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教育,这个教育抓好了,实事求是之风,艰苦创业之风,勤俭节约之风,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之风,才能大兴

起来,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奢侈浪费、以权谋私等等歪风才能扫除掉。”从我们工作的实际经验来看也是如此。你到一个地方去处理复杂的问题,你要讲群众的话,要穿群众式的服装,比如我在晓南事件中,50 岁以上的老头就喊老倌,30 岁以下叫伢子,与群众打成一片,距离就近了。但是如果你在坚持群众路线处理问题过程中,你又搞形式主义、你又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是你派了一个其他的领导去开个会、拍个板,你自己就不去了,绝对搞不好。你到那个地方搞享乐主义,睡要睡好地方的,吃要吃好的,自己抽和天下、芙蓉王,跟群众有距离,还是很难与群众打成一片。然后你到那里去,到村里面你就走到支部书记家里就不动了,你不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所谓最后一公里问题,就是你深入群众,到了支部书记家里,从支部书记到农民家里最后一公里,你不解决问题,你这个群众路线还是走不好,群众还是不会拥护你。所以中央提出开展群众路线,反对四风,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到点到基层,到最基本的单位,基本的单位就是个体,你走群众路线必须到千家万户。我处理晓南事件到那个村,100 多户人家,我家家家户户我都走到了,名字都喊得出了。所以说你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反“四风”,你要有“四风”,你就不可能坚持真正的群众路线,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看到,为什么要反“四风”,它与群众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反“四风”,才能扎扎实实的走好群众路线。江总书记

指出：“真正学会运用党的群众路线，需要经历一个端正立场、改造世界观、锻炼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长过程，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做到。我们还要结合建设和改革新的实践，创造新的经验，丰富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同志们，我对

群众路线的学习和实践，学的不够，做的不够，与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比有很多差距，希望大家多多包涵，讲得不好，请大家原谅包含，谢谢大家。

向毛主席学习走群众路线

市政协副主席 周韶光

(2014年4月18日)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主席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榜样，是广大共产党人永远学习的楷模。

毛主席始终不渝地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强自立地谋取福祉，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人民尊称他为“人民领袖”。我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唯有毛主席才有资格戴上“人民领袖”这个至高无上的桂冠。

毛主席去世后，社会上曾经出现了一股反毛否毛污毛的歪风，对毛主席造谣泼脏水，恶毒诬蔑毛主席是“秦始皇”、“搞独裁专制”、“不顾人民死活搞阶级斗争”，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近些年来，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和一大批正义之士的据理反击，历史真相清晰起来，泼在毛主席身上的脏水被逐步清除，人民群众更加想念和热爱毛主席。毛主席纪念堂开放以来，前往瞻仰毛主席遗容的群众累计达到2

亿多人次。今年清明节，毛主席纪念堂只上午开放4个小时，群众排队长达3公里，瞻仰人数达10多万。这几年前往毛主席故乡韶山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每年超过1000万人次。这就叫做：人民不死，毛泽东永恒！

毛主席一生为人民，人民热爱毛主席，这就是领袖与人民的逻辑关系，这就是历史唯物论。我们今天十分有必要强调向毛主席学习，学习毛主席的人民观，学习毛主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学习毛主席的人民观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表述是：“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些表述，都来自毛主席的论述，是我们党九十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和实践，集中体现了他的人民观。我们学习和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就要学习毛主席最伟大的人民观。

毛主席的人民观,可以用他最为经典的两句话来概括。一句话是他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另一句话是他在1941年《〈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基础就是人民史观或称群众史观,即只有承认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的本原和主体,只有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和源泉,才能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和发展规律,才能正确认识政党、领袖、英雄、个人的作用。

毛主席正是认识人民史观的杰出代表,他在人民史观的基础上,形成并始终坚持和践行人民观。我们看毛主席一生的所有伟大作为,无一不与他的人民观紧密相连。

为什么毛主席在青年时代就能够立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向?青年毛泽东曾经信奉过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但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看到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必须彻底改变,他看到了中国人民一定会成为改变中国屈辱地位的主力军,因此,他相信只要立足于依靠人民的力量,就一定能够找到中国自立自强的道路,就一定能够改造中国和世界。1919年,26岁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集中表达了他对人民群众力

量的深刻认识。他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这几样根本的一个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文章充满豪情地说:“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请看,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人民力量的认识是何等的深刻,对民众大联合赢得成功是何等的自信!这种深刻和自信,就是他的人民观的集中而生动的体现。从此,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人民观,贯穿了毛主席的一生伟业。

为什么毛主席在井冈山敢于放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7年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尽管红军队伍力量极其弱小,尽管面临蒋介石军队的四面围剿,尽管革命队伍里有不少人怀疑“红旗到底能够打得多久”,但毛主席就是敢于放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这种豪言壮语,完全出于他对中国革命形势深刻而独到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成功,而且必须是多国同时革命才能胜利。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证明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可以在落后国家首先取得成功。而毛主席立足于中国国情,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现实。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十分弱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才是革命最可依靠的力量,只要我们党在农村放手发动农民群

众,紧紧依靠农民群众,就一定能够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地方打开缺口,积蓄力量,最终推动中国革命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就是毛主席的人民观再一次起到作用。

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敢于领导抗日军队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和我们党一方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抗战,另一方面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面对日本侵略军的残暴“三光政策”和疯狂扫荡,是什么力量促使毛主席、共产党作出这样的决策?还是人民的力量!毛主席、共产党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才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这个观点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著作中都有充分的论述,在他看来,我们党和军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就可以让日本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八年抗战期间,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依靠人民群众,运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等灵活机动的战术,消灭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让日本侵略军只能龟缩在城镇据点和铁路沿线。毛主席领导人民和人民军队开展游击战,为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毛主席能够在短短三年内彻底摧毁蒋家王朝?按照战争的一般规律,战争都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但是中国解放战争打破了这个规律,由战略防御直接转入了战略反攻,短短三年时间,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埋葬了蒋家王朝。究其根本,还是毛主席紧紧依靠了人民的力

量。以淮海战役为例,我军 60 万兵力对蒋介石 80 万兵力,但我们党动员组织了 543 万支前民工,解放区人民踊跃支前,国统区人民反抗反动统治,是民心的向背决定了战争的胜败。后来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关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我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我们回味。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但作为这三大战役统帅的毛主席,建国后很少大书特书,倒是他老人家曾经三次提到了“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1956 年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讲话时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这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正是因为我党我军忠实地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让人民群众看到了我党我军的高尚和伟大,才坚决地支持解放军打老蒋。这就是毛主席打败蒋介石的底气,这就是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候,我想,这一定是他老人家对人民群众感情的自然流露。

为什么毛主席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后来有人说毛主席“革命有功、建设有过”,说由于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国家还面临帝国主义的战争威

胁和经济封锁,毛主席坚持走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中国很快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和推动下,努力建设现代工业化国家。毛主席主政的二十七年,中国取得的建设成就是巨大的,是不可否定的。这二十多年,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业国成长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在一个绝大多数人是文盲的国家普及了义务教育,人均寿命有 1949 年的 35 岁提高到了 65 岁,国家拥有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钢铁、石油、煤炭、粮食、棉花、棉纱等主要产品产量都进入了世界前列,经济年均增长 8.5%,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第 13 位上升到第 6 位。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连国外学者都不得不惊叹。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是以他的伟大的人民观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他不仅要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还要让中国人民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四个现代化都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他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也完全是依靠人民的力量。

纵观毛主席的一生伟业,我们都能看到:毛主席的人民观树得最牢,实践得最彻底,毛主席是坚持人民观、坚持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最伟大典范。毛主席的人民观成就了他的伟业,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学习毛主席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

人们都说毛主席是“一代伟人”,当年林彪说毛主席是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王震将军晚年说毛主席比我们这些人“早看五十年”。确实,毛主席是“伟人”,是“天才”,是站得高看得远的伟大领袖。但他的伟大,他的天才,他的高瞻远瞩,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他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造就的,是他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得来的。

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毛主席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学习。在这里不一一列举毛主席依靠群众的具体工作方法,我们共同读读毛主席的若干论述,着重了解毛主席进行调查研究的生动实践,来学习毛主席是如何重视和践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方法的。

先学习毛主席几段讲话:

毛主席说:“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毛主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毛主席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

毛主席关于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最为经典的一篇著作是他在1943年6月1日发表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主席这段论述，是对我们党的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最集中、最充分的概括和阐述。

学习毛主席的这些论述，纵观毛泽东一生的伟大实践，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坚持了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离不开调查研究。毛主席是开展调查研究的楷模和典范。下面我们就看看毛主席重视调查研究的实例，从中感受毛主席走群众路线的风采。

毛主席早年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曾利用暑假，与同学萧子升一起，不带分文，步行游走湖南的长沙、宁乡、安化、

益阳、沅江等五县。后来萧子升写了一篇《和毛泽东一起行乞记》，说他们是一把雨伞，一个挎包，带上文房四宝，靠写几个字作点诗换口饭吃，叫“打秋风”，形同乞丐。

1926年，毛主席通过调查，写作了《中国佃农生活举例》。

1927年大革命时期，毛主席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曾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江西中央苏区，毛主席花了大量时间搞调查研究，写作了许多调研文稿。毛主席后来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现在保留的调研文稿还有6篇：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1930年10月的《兴国调查》，1930年11月的《东塘等处调查》和《木口村调查》、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毛主席搞调查研究，都是自己亲手做记录，亲手撰写调查报告。他说：“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毛主席在江西苏区写的这些调查报告，长的有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分5章39节；《兴国调查》有3万多字。短的几千字，如《木口村调查》不足2000字。这些调查文稿，都是毛主席心血结晶，为当时党和红军了解情况，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和重要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领导开展大

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可以说是日理万机,但始终重视调查研究,花了大量时间开展调查研究,从人民群众中听取意见,汲取智慧。据有关资料记载,建国后毛主席一共离开北京 57 次,到外地搞调研听汇报。最长的一次是 1974 年 7 月 18 日至 1975 年 4 月 13 日,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等地逗留长达 274 天之久。当时的毛主席已是 81 岁高龄,体弱多病,而且患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但仍然在各地调研视察。

毛主席离京外出巡视和调研,其实是十分辛苦的。因为担心坐飞机不安全,中央 1958 年作出决定,毛主席外出都坐火车。从此,毛主席的专列就成了“流动的中南海”,沿途找各地领导同志谈话,视察工厂农村,毛主席说:我在北京呆久了,脑子里就是空的,一出去,脑子里就有东西了。

毛主席在北京的日子里,同样也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他不仅让身边的秘书、警卫员下去搞调查,而且自己经常听取各部门汇报。听汇报其实也是十分辛苦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 1956 年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前的听汇报。当时毛主席已经 63 岁了,从 2 月 14 日至 4 月 24 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毛主席花了 43 天时间,听取了国务院 34 个部门的汇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为了认真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我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毛主席组织发动的 1961 年农村大调查。

我们知道,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取得了很

大的成就,但也显露了许多问题,主要是在生产关系调整上追求“一大二公”,片面强调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二是实际工作中出现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提出三面红旗就体现在吃食堂,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敞开肚子吃饭,盲目追求生产指标,导致下面大量出现弄虚作假的“浮夸风”;三是从 1960 年开始,中国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加上与苏联关系开始破裂,苏联撤走援华专家,逼中国还债。这些天灾人祸,使人民生活出现较大困难。尤其是农村,农民都集中到食堂吃饭,生产积极性下降,平均主义抬头,积累的粮食很快吃光了,一些地方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更多的人得了浮肿病。

当时中央实行一线、二线领导体制,毛主席已经退到二线工作。退二线是毛主席从 1953 年就开始提出来的,到 1959 年中央就正式分了一线和二线,一线是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组成的中央书记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毛主席、朱老总、董必武、林伯渠等年岁大的同志退到二线,主要是搞点调研,听听汇报。

其实,毛主席对农村出现的问题很早就觉察到了。他对“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是反对的,对各地“放卫星”、搞浮夸是不满意的。1959 年 4 月 29 日毛泽东发布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现载《毛泽东文集》第 8 卷 48 页,题目叫《党内通信》。毛主席在信中说:“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几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有何益处呢?”毛主

席在信中特别提到了讲真话的问题,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到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受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主席最后写道:“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是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从这篇现已面世的《党内通信》可以看到,真正搞“冒进”、搞浮夸的,并不是毛主席,而是另有其人。

这里还可以举时任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同志的例子来说明。江西省 1959 年 10 月中旬召开干部大会,邵式平省长传达他在中南海面见毛主席的情况。毛主席对邵式平说:“你回江西要抓好农业,民以食为天啊。亩产万斤、几十万斤都是吹牛,中国的良田和人口不成正比,要保护好良田。”报告会快结束时,邵式平突然说:“食堂越大越反革命。”全场干部一片惊愕,因为人民公社办食堂是中央的指示,这么说岂不是对抗中央?这时,邵式平从怀里取出一张纸条念给大家听:“‘食堂越大越反革命’。落款‘毛泽东’。这是我向毛主席汇报人民公社吃食堂的弊病时,毛主席大笔一挥写给我的,谁都没报告,先向同志们报

告,方才周总理打电话叫我派保密员把纸条送到北京。”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农村出现的问题是十分清楚的。面对国民经济出现困难,农民饿肚子,毛主席发现了问题,坐不住了,不得不出面开始调整。

1960 年 12 月 24 日至 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整风整社,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强迫命令风等“五风”。在最后一天的会上,毛主席讲话:“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要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必须从实际出发。我们的同志多少年来不做调查研究,只要不作这种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情况明才能决心大。”同时,毛主席也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毛主席要求与会的高级干部回去后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

接着的 1 月中旬,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毛主席再次重申调查研究,明确提出 1961 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八届九中全会结束后,毛主席首先带头开展调查研究,他自己去了杭州,同时派秘书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去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用10至15天时间,各调查一个最好的队和一个最坏的队,然后直接向他汇报。1月21日,三个调查组离京奔赴三省农村。

由胡乔木同志率领的这个组来到了湘潭县石潭公社古云大队。当时胡乔木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调查组成员有《红旅》杂志社编委王力、中央办公厅王愈民、中组部张竹梧(湘潭县继述桥人)、国家计委于明,加上省委指定的3个人陪同调查,一共8个人。省委指定的是毛华初(解放初期曾任湘潭县委书记,是毛泽民的养子,毛主席的侄子)、湘潭地委政研室主任李炎巨,还有一个是湘潭县委办公室干部赵荣球。

调查组是除夕前的1月3日下午到的古云大队,就住在大队部。只有胡乔木睡木板土砖搭的单人铺,其他人都睡通铺。当时没有电灯,用的是煤油灯。1月31日(第二天)就开始走村入户访问社员群众。

第一天,胡乔木就到了一个叫易少华的社员家里。当时看到北京来这么大的领导,易少华家里的人都不敢说话,胡乔木开导说:“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只是搞调查,就是要弄清楚你们生产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们再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调整和制定农村政策。”这样,易少华一家才打消顾虑,如实讲了真话:“饭吃不饱,搞食堂要不得,会饿死人的。”

胡乔木又选了队上食堂开餐的时间,来到食堂实地调查。当时食堂里有些社员在吃饭,但胡乔木发现饭桌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灰,觉得有蹊跷。他拉了一个名叫陈立泉的社员到旁边问情况,开始陈立泉不敢讲,后来在胡乔木的开导下,也把实话讲了。原来,集体食堂实际上早就办不下去了,这个食堂已经停伙了,社员按量到食堂来领米、领盐,回家自己用罐子煮了吃。只是因为听说中央调查组来调查公共食堂的情况,怕挨批评,队上才临时开伙,让社员来集中吃饭。

胡乔木问得很仔细:“为什么回家用罐子煮饭煮菜吃呢?”陈立泉说:“家里冒得锅子了,砸锅炼钢铁去了,只能用罐子做饭菜。”

通过调查,调查组了解到,古云大队共办了27个公共食堂,因缺粮缺菜缺煤,大都已经停办,每次都是为了应付检查才临时开伙,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接下来几天,调查组又了解农村生产情况。古云大队1957年粮食亩产450斤,人平分粮840斤,还上交国家余粮82万多斤。但到1960年,亩产只有142斤,人均分粮只有255斤,比1957年减产72%。全大队不仅没有上交余粮,还由国家统销21万多斤。

调查组还了解到干部瞎指挥风也比较严重。胡乔木与妇女座谈,妇女反映:每天都和男劳力一起出工,冬天打赤脚翻冰,有点吃不消;肚子填不饱,体质虚,有的连身上月经都不来了。

社员还反映:除了搞生产,还要搞

政治运动，每天收工后要批落后分子，叫做“插绿旗”、“背乌龟”，搞得社员每天紧张得没一点自由。

胡乔木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在这次调查中，对古云大队4个生产队、25个作业组进行了全面调查，重点对12户农民的家庭生活情况进行剖析式调查。通过调查，胡乔木意识到，在农村基层，干部的瞎指挥、浮夸风确实很严重，党员干部随便打人，层层扣饭、控制农民自由，不准搞家庭副业等问题，都使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走了样，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

调查组写出了《湘潭县石潭公社古云大队调查》的报告。2月中旬，毛主席来到长沙，专门听取了胡乔木调查组的汇报。在此之前，毛主席在杭州已经听取了田家英的汇报，对农村存在的问题，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弊端，已有了基本的了解。在湖南听取了胡乔木调查组的汇报后，毛主席又来到广州，听取了陈伯达调查组在广东农村的调查汇报，反映的情况也基本一致。

3月份，毛主席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南方三个省的工作会议，接着返回北京召开了北方三个省的工作会议，紧接着再次来到广州，把南北两个会议合并起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历史上简称“广州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针对农村存在的问题，毛主席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史称“农业六十条”。会议决定将这个《条例》(草案)在全国试行，并确定各级领导同志分头下到农村，围绕“农业六十条”试行情况再次开展大调查。

于是，广州会议之后，从党的领袖到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走出机关，宣传“六十条”，解释“六十条”，解决贯彻执行中的问题，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们看过的《周总理的四个昼夜》电影，讲的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

当时，刘少奇到湖南的宁乡、长沙县调查了44天。周总理4月底到5月初到河北邯郸的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朱德同志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调查。陈云到上海青浦县调查。邓小平、彭真带5个调查组到北京市的顺义、怀柔县调查。习仲勋到河南长葛县调查。杨尚昆到河北徐水、安国县调查。胡耀邦到辽宁海域调查，等等。这样全党范围的大规模农村调查，是党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

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再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各级调查研究的情况和意见，又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了修改，最后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确定适当缩小社队规模，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解散公共食堂，恢复家庭副业。这次全党范围的农村大调查和“农业六十条”，对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复苏农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详细介绍1961年的农村大调查，就是要了解毛主席当年怎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就是要重温和学习毛主席那个时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这里顺便讲一下：1991年，湘潭县委搞了一个“古云三十年变迁”的调查，

我当时在市委办公室工作,对这个情况有详细的了解。我跟当时湘潭县委办副主任郭奇志还一起到省委去拜访了时任省委政研室顾问的李炎巨同志。他是当年陪同胡乔木调查的亲历者,也是1991年这次“古云三十年变迁”调查的倡议者。李炎巨给我们介绍了当时许多情况。比如,为防止当地社队干部干扰调查,让农民讲真话,调查组到社员家里访问时,屋外都有警卫人员站岗,不允许社队干部进来干扰。比如,胡乔木要求调查组成员要详细作谈话记录,听不懂的话,写不出的方言词,都用同音字或拼音先记下来,再找县里熟悉方言的同志核对。这些调查方法都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地学习。

毛主席重视调查研究,是他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方法,是他始终相信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的生动体现。毛主席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发表了著名论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原名就叫《调查工作》,因为战争原因,最初的材料丢失了,直到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馆向全国征集文物时,才在福建龙岩发现了这篇文章的石印本,毛主席看了非常高兴,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编入《毛泽东选集》。这篇文章开头就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完全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文章把调查研究作了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

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961年毛主席把这篇手写的石印本发给中央及地方领导同志,说:我的有些文章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

毛主席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为后人作出了榜样,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重温和学习毛主席的这种工作方法,就是要真正懂得什么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学会怎样才能从群众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点,对政协参政议政工作十分重要。

三、学习毛主席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办事

1947年秋天,党中央撤出延安后,毛主席率党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在陕北佳县,毛主席看到战争使不少庄稼被糟蹋了,群众家里粮食也不多了,羊也丢了不少,心情非常沉重。他找佳县县委书记谈话,反复嘱咐一定要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好,把生产组织好。谈话结束时,县委书记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挥笔写下:“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毛主席的这个题词,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也道出了毛主席本人说话办事最根本的立场和态度。

我们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我们共产党人看问题办事情,就一定要坚持人民的立场,把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满意不满意、赞成

不赞成、拥护不拥护作为评判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

第一,站稳人民立场,首先要解决一个对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认识问题。

有人以为,我们党是执政党,党是领导核心,就可以高高在上,可以对群众居高临下,一切都得听我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是没有搞清楚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关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党在历史上有多种表述。据我学习研究,至少有8种表述:

一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毛主席给湖南一师题写的校训就是:“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中说:“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1957年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说:“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毛主席把党群干群关系比喻成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不仅是讲的工作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强调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才是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领导核心的根本途径。

二是土地与种子的关系。1945年10月,毛主席结束重庆谈判回到延安,面对蒋介石挑起内战的严峻形势,决定从延安抽调大批干部分赴全国各地前方,以备战争之需。他对出发的干部提出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毛主席把共产党人比作种

子,把人民比作土地,说明共产党人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置身于人民中间,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三是孺子与牛的关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说:“‘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孺子牛”的典故出自春秋故事,齐景公带儿子玩耍,自己装作牛爬在地上,让儿子骑在自己背上,结果儿子不小心摔下来了,齐景公自己也折断了牙齿。毛主席提出党群关系是孺子牛的关系,就是教育党员干部决不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是人民可以骑到你的身上来。

四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1944年底,毛主席在《1945年的任务》中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作了明确的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这是我们党正式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党群之间的这一关系。

五是鱼和水的关系。毛主席在延安一次会议上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永远也离不开水。”1957年7月,毛主席再次强调:“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

成了,也不可能巩固。”这里,毛主席把党群关系上升到了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

上述5种是毛主席说过的。在党的历史上,还有其他领导人说过党群关系:

六是朱德和邓小平说过的父母与儿女的关系。

七是刘少奇1951年3月最早提出党群关系是血与肉的关系。现在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这一表述。

八是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提出党群众关系是工具与使用者的关系。

不管哪种表述,都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一种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关系。

党的历史表明,人民群众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绝不是一个政治标签和文件术语,而是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我们只有把这个关系搞清了,才能真正站稳人民立场。

第二,站稳人民立场,必须培养和加深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毛主席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出自他对人民的热爱。这种爱戴之情,是他在长期的实际生活中逐步培养锻炼的结果。他自己曾经坦率地介绍过自己感情变化的经历,他说:“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

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

我们作为机关的党员干部,仍然有一个培养和加深对人民群众的感情问题。我看了《周总理的四个昼夜》,其中描写周总理与邓颖超想收养张二廷的一个儿子的情节,就处理得非常好。张二廷媳妇去世了,家里4个子女,生活非常困难。但周总理和邓大姐并不完全是看到他家里困难才提出收养,而是因为他和邓大姐一生没有生育子女,才有收养的想法。如果描写成纯粹是同情张二廷的困难,就变成了恩赐、施舍。电影现在这样描写,正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感情。当张二廷犹豫并表示已经答应了自己死去的媳妇,要独自养活4个孩子时,周总理表现出深深的理解,这也是正常人的感情。

我认为,培养和加深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尤其要培养和加深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劳动人民是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尽管他们可能身上是脏的,手是黑的,腿上沾着牛屎,但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无论用怎样的崇敬之情来对待他们都不过份,都是应该的。当今社会,由于社会分工不同,由于利益分配不够公平和均衡,劳动人民常常处于社会的底层,有的生活还有比较困难,我们应当满腔热忱地深入到他们中间去,与他们打成一片,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第三,站稳人民立场,必须把为人民想问题办事情体现在细微处。

毛主席既是叱咤风云办大事的伟人,又是细微处见真情的平常人,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常常从许多细微之处

体现出来。1950年,淮河水灾,听说老百姓有不少人为躲避洪水爬到树上,却被毒蛇咬死,毛主席悲伤地流下了泪水。1957年,他的一个警卫战士探亲回来,带了一个又黑又硬的窝窝头,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吃了一块,泪水就流下来了。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种粮人吃的粮食啊!”细微处的感情表露,往往就是发乎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往往也是开天辟地办大事的巨大动力。我们看毛主席,正是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让中国老百姓尽快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情结在起作用,所以他才发动人民群众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尽管这当中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等“冒进”的错误,但我始终认为,这都是“好心做了错事”,历史地来看,人民都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

其实,毛主席叱咤风云为人民办的那些大事,不仅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而且许多建设成就至今还在发挥作用。以毛主席时代兴修水利为例,几乎全靠肩挑车推,全国各地共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8万多座,开掘人工河道近百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溉区5000多处,灌溉面积达到8亿

亩。据测算,毛主席时代的中国水利工程总量相当于1200座三峡工程,相当于每年兴建40座三峡工程,平均每年投入8亿元,相当于目前的240亿元。今天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毛主席时代修建的水利工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要延缓许多年。

细微与显要,平凡与伟大,就是这样一种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关系。今天的我们,与其许下为人民做大事的宏愿,不如先培养好对人民的真情实感,认真做好每一件有益于人民的小事细事。只有带着深深的感情,把对人民有益的每一件小事细事都做好了,才可能去做好对人民有利的大事难事。做好小事细事,同样可以体现出人生价值,体现出思想境界的崇高和伟大。

结语:我们今天学习毛主席走群众路线的思想和精神,说到底就是要强化一种观念,即在人民群众这个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面前,任何个人都是渺小的,千万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太英明太伟大,更不能把自己置身在人民群众之外和人民群众之上。融入到人民群众之中,从人民群众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人人都会成为好样的!

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市政协原副主席 王运强

(2014年4月29日)

同志们：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组织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党风、政风、民风有了明显的改善，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拥护。我们政协机关已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机关离退休的同志也积极投身进来。为了与在职的同志共同学习，政协党组交给老同志一个任务，就是谈谈老同志过去亲历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与体会，并参与机关组织的大讲堂活动中来。为了作好这个讲座，机关离退休党支部近期分批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老同志从不同时期、不同环境讲述自己亲身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为此支部收集和整理了这些口述资料，在这里代表他们讲述出来。

老同志讲述的各种故事集中反映了一个主题就是：“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这也是今天我所讲的题目。讲座分三个部分。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座谈会上，政协离休老干部、原政协副主席王耀章同志，深情的回顾了自

己在战争年代所经历岁月，深切的谈到了那个年代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王耀章同志出生于1930年4月，生在河南省武陟县西尚村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这是河南靠北的地方，靠近太行山区。在他12岁后，家乡发生了很多事情，至今使他刻骨铭心。一是自然灾害。水灾、旱灾常有的事，还有十分可怕的蝗虫灾害。田里收成本就不多，当蝗虫来时遮天蔽日，一冲到庄稼地里，不管是玉米、谷子、还是高粱，半天不到就吃得精光。二是日本侵略军侵略中国，在侵犯到河南，经常到农村烧杀抢掠，老百姓家里的粮食、牛羊、鸡鸭、衣被只要搜到的，都被抢掠一空，同时还杀人放火。王老家六间房子就被烧了三间，有一次日军来扫荡，还没来得及逃走的人，一次就被杀了9个，老的小的。三是国民党地方政府不关心老百姓死活，还以各种名目强征各种苛捐杂税。当时国民党地方政府也打着抗日的牌子，只要县长、乡长批个条子，就可以拉起一支队伍，多的一、二百人，少的十几个人。老百姓把他们称为“杂牌队”，这些队伍的枪支、弹药、吃饭、衣被

以及当官的坐骑等一切费用,都出在老百姓身上。而这些交上去的钱、粮很大一部分又都被当官的贪污了。而且国民党地方政府拉起的“杂牌队”还经常到老百姓家里派饭派住,走的时候好的被盖都被卷走。这段时期国民党的中央军还经常到村里来抓“壮丁”,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在那个年代日本人、国民党、“杂牌队”是“三只魔掌”同时伸向老百姓,加上自然灾害,老百姓的生活真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当时那些国民党地方政府组织的“杂牌队”后来多数投靠了日本人,当了“皇协军”,老百姓称之为二鬼子,老百姓对“三只魔掌”恨之入骨。

人们为了保命,把能带走的东西包扎好,带不走的埋起来,晚上睡觉是和衣而睡,一听到动静,立即就往外逃。在外逃中被打死的,饿死的是常有的事。老百姓为了千方百计的设法不被饿死,每年秋天,老百姓就从田里、山上到处收集能吃的东西,如红薯叶、红薯藤,各种菜根、野菜,包括谷糠、花生壳、榆树皮。到了春天就去采集能吃的树叶子,什么榆树叶、柳树叶、椿树叶、杨树叶、槐花槐叶槐豆等等,当地老百姓称之为树头菜。

就在这种苦难的日子里,老百姓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共产党组织的各种抗日武装部队。他们转战在太行山区,吃、穿、住全部自力更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群众中口口相传,大家心里都盼着这种队伍的到来。1944年下半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一直战斗在北方抗日前线

的八路军解放了北方大片土地。这一年的10月的一天早晨,王老他们村子里人起床后,街上人声沸腾,只见穿着灰色军装的人在扫街,给老百姓家里挑水。有人悄悄的相传说这些军人昨晚就进了村,全睡在街上或老百姓的屋檐下,这时天已大亮,人们看清了他们佩戴的臂章是“八路军”,过去他们只听说过八路军,今天真的来了。当天上午,八路军就组织村民开会。给老百姓讲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军队,是来解放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要赶走日本兵,是来为老百姓服务的。当时王老村上的人听这些道理一是新鲜,二是也似懂非懂、将信将疑。但是在随后的日子,老百姓看到八路军所做的一切就真正懂了。他们看到八路军没有一人到老百姓家里派饭、住宿,全是自带粮食,自己动手做饭,如用了老百姓的柴草都要付钱,当他们了解到村上有揭不开锅的村民还送粮上门。相比之下,老百姓看到的日本兵、皇协军、国民党以及那些杂牌军,欺压老百姓的罪行。不得被八路军感动,不由得深深爱上这支部队。

当八路军解放这些村庄后,开始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给老百姓办实事。为了消灭蝗虫,八路军自己带头组织群众一起挖蝗虫卵,并宣布挖一斤蝗虫卵兑三斤小米,一时间全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王老说他们家三兄弟一天可以挖一斤多,这些可换三斤多小米,天大的好事。老百姓很感谢八路军,在上交蝗虫卵中也十分认真,把挖出来的蝗虫卵上沾的泥土、杂质清了又清,他们说不

能让八路军吃亏。多么好的军队,多么好的人民,老百姓和八路军真正已是心贴心了。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的一天,日本人从焦作过来侵犯解放区,八路军立即投入战斗,这时老百姓也自动组织起担架队来救护伤员。王老的奶奶当时已70多岁,也出来帮助医护人员给伤员清洗伤口,喂饭喂水。战争打了整整一天,把来犯的400多日军全部歼灭。在这一时期,王老的哥哥参加了八路军,他父亲也是村上一员村委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发动了内战。1946年国民党侵占了王老的家乡,一时间把刚刚解放不久的村庄搞得天昏地暗,仍旧和过去一样欺压老百姓,特别对解放区的老百姓实行反攻倒算,这年十月,王老的父亲、弟弟被国民党杀害,王老当时在学校读书,闻讯后逃走。这时八路军领导区武工队,找到了他,把他带进了队伍,接到根据地。

为了打击国民党残杀群众的气焰,武工队昼伏夜出,特别是得到了老百姓的帮助,敌人一有风吹草动,武工队都从老百姓提供的信息掌握,而武工队穿行在村里,敌人连风都摸不到,就这样一有机会就抓住残害群众的首恶分子,就地正法,并统一署名:八路军武陟县独立营、武陟县武装工作队。有效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就这样连续抓获敌首分子,使敌人退出农村,缩头到县城驻扎。

王老在座谈中特别兴奋的谈到两次支前的事。一次是1948年初,共产党和国民党进入决战阶段,这时有大量的支前任务。王老当时也接到一个具体任

务,由他负责与各区联系,组织马车队、土车队。上级要求,要他组织马车150辆、随车需要的大牲口450头,赶车的车夫300人,土车200人,担架200副,抬担架400人,负责保卫的武装民兵两个排。按照命令要在规定的时间、地点集合,当时王老才18岁,18岁要带领近2000人这么一支大队伍,大家都十分听指挥,为什么?因为大家心齐,人心向着共产党。而且这些支前的老百姓,没有任何报酬,要自带牲口包括牲口吃的草料都自备,但是这些老百姓都很积极。大家都知道,淮海战役,解放军投入兵力60多万,但是组织的支前民工是543万,是解放军的9.5倍。所以陈毅同志不是有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我记得我在政协有次到西伯坡参观展览的时候,那些场景、那些图片是非常让人感动的。还有一个故事,进犯解放区一个军团好几万人,进犯解放区,进去以后找不到粮草找不到老百姓,他们自己的粮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寸步难行,饿的不得了。后来被包围了,被包围后他们发现呼啦啦的一下子老百姓就冒出来了,呼啦啦的一下子老百姓一车车的粮食送给解放军,所以解放军把他们包围起来围而不打的时候,就举着手上的馒头喊:“过来吧,吃馒头。”

还有一次是1949年4月,王老随军南下,到达攸县,部队为解放衡阳作准备,把衡阳围起来了。王老接到一个任务就是筹借军粮。当时南下速度很快,被解放的地方一下还来不及建立政权,向老百姓借军粮,就必须依靠当地

老百姓,王老来到离攸县县城的一个株山乡的地方去找农民,向群众宣传动员,解放军南下,不但要解放衡阳,还要解放全中国,还宣传借粮的政策,返还的时间,当地农民都相信,他们说早就盼着共产党来。当地有个农民叫彭春林,读过4年小学,懂得多一点,不但主动为王老带路、走家串户,告诉王老哪家有能力借,晚上还安排王老到家里住,为第二天借粮作准备。在老百姓的支持下,四天时间王老和其他乡借粮的同志一起如数的完成了三万斤军粮的任务,及时送上前线。

从王老亲身经历的这些事,可以看到全心全意的为人民谋利益,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也可以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胜负,早就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已经决定了。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就能保持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毛主席早在1934年就说过:“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大家都知道,对西藏的解放和内地的解放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那就是西藏是从农奴制一跃到社会主义制度,这

么一个巨大的变迁,是共产党紧紧依靠西藏人民实现的。我们政协退休的老同志廖述德就亲身经历了这一个变化。

廖述德同志是1956年进藏到1989年离开。在西藏整整工作了三十四年。他在讲述这34年西藏的经历,心情十分激动。廖述德同志是1956年在成都气象某校毕业,当时才17岁,按计划是分配到上海,但他和很多热血青年一样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而他的父母都在长沙,也十分支持他的想法。这样组织上分配他到西藏。当时进藏的交通很不方便,他和一起进藏的同学们从成都坐车到达拉萨用了一个月,走走停停,道路是边走边修。在西藏的34年,廖老经历了多个工作岗位,辗转了多个地区,参与了1959年的对西藏叛乱分子的战斗,西藏民主改革,1963年对印度的反击战和西藏各个时期的经济建设。

廖老告诉我们,1956年进去后,见到西藏农民的悲惨生活。西藏农民制是世袭的,最上层的是领主、贵族、喇嘛,中间是自由民,最下层的农奴,农奴只能与农奴通婚,生下的儿女还是农奴,农奴是上层人的私人财产,可以任意宰杀,可以买卖,可以送人。农奴没有土地、没有房屋、没有牲口等任何生产资源。1956年随部队进藏时,还没有建立地方政府,只有工作委员会,想通过对上层的统战工作,采取逐步改革。但西藏上层在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受到解放军的坚决回击,一举消灭了叛军,一部分上层叛乱分子逃出西藏,从此推翻了西藏农奴制,铲除了西藏统治者。

开始建立共产党的基层政权,展开西藏的民主改革。这段时期,廖老和他的同事们深入到农奴中做工作,和他们亲密接触,和他们交朋友,并实实在在为他们看病,解决生活上各种困难。藏人喜欢跳集体舞,廖老他们也参与进去,农奴们高兴时喝青稞酒,很多人一个圈,就一个杯子,倒满喝下,把杯子转到下一个,廖老他们也很痛快,接着杯子,学着他的动作一涌而进,农奴看了很高兴,把你看成自己人,感情一下就拉近了。通过不断的宣传和政策的解读,并把从叛乱分子没收的一切财产,分配给农奴,把没有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家里多余的财产,包括土地、房屋、牲口,政府通过出钱赎买的方式拿过来,也无偿的分配给农奴。使祖祖辈辈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农奴分到了土地、房屋和牲口,特别是人生获得了自由。各个地区都有党和政府派下去的民主改革工作组和队员,农奴们一下子得到改变,他们说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激动,他们万分感激,也很朴实,而对工作组和队员们,他们从内心喊出工作组万岁,甚至喊出组长的名字,也呼万岁,工作组同志亲切的告诉他们这一切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带来的,要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正是这些朴实的西藏人民、在1963年对印反击战中,他们积极参加支前工作,不少群众背着弹药,赶毛驴,把部队急需各种物资送上前线。使解放军很快的打赢对印反击战,打出了国威和军威。

廖老在回忆中谈到,在西藏自然条

件是十分不适应的,开水到70多度就开了,蒸馒头、米饭都蒸不熟,经常是半生半熟的吃,天寒时雪下30多天,但他们不顾自己,想的是如何尽快改善老百姓生活。1956年进藏,西藏没有一所学校,上层人子弟读书要么送外地,要么进寺庙读书。所以几十年来,党和政府帮助建起了各类学校、医院、水电站,修了无数条公路。由于实实在在为老百姓作想,西藏老百姓与政府十分亲近。廖老记得有一次从县开车到拉萨去办事,走到一个叫俗坡乡的地方,车子坏了,要修。廖老就下车,坐在路边上休息,这时来了一个放羊的老农,一眼认出了他,跑过来欢叫,同时把乡里的老乡叫来了不少,大家围着廖老,个个争要扯他到家里去,因为廖老曾经在这个乡当过民主改革的组长,如此的盛情,最后在老乡的拥戴下,到了村里,老乡们拿出他们最好吃的东西招待,一个劲的叫廖老不要走,在村里多住几日。廖老反复解释,车修好要赶拉萨办事。这种朴实的亲情,这种血肉一般的关系,廖老深深感到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带来的。

这种场面,在不同的地方也出现,座谈中,吴帅珍、隋从四同志也谈到自己永久难忘的那亲如一家的场面。1964年他们都还在部队,驻扎在广西。那一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吴帅珍同志到了广西兴安县搞社教。这个地方是山区,长年缺水,种不了粮食,只能种辣椒,因此当地老百姓生活很苦。社教工作组和部队看到这种情况后,就组织老百姓一起修水利、建水库、挖渠道。这样

彻底的解决了水的问题,山区老百姓有水,就开田挖地,种上多种植物,生活也大为改善。后来社教结束,当工作组和部队离开时,整个乡的老百姓都出来了,送工作组和部队的同志,有的泪流满面,手上有的拿着鸡蛋、水果非要送上车。这种场面回想起来就激动。

我们政协离退休的老同志中,有不少都曾经在农村工作过,当过大队、公社、乡、县的负责人,如黄水清、文纪署、李文学、陈光华、谭淑芳等等,他们在座谈中,也回顾自己农村工作经历。那时,他们很少坐办公室,一年四季在田头和农民家里跑,经常吃住在农民家里,随时和农民唠家常。就象一家人一样,关系非常融合,随时可以听到群众意见。上级来的领导也是很朴实作风。李文学回忆到:1962年胡耀邦同志来到陵县(现叫炎陵县)考察,白天在乡里考察,晚上县领导安排他到招待所入住,他不去,就近住在公社,晚上还到田头,去看农民捉泥鳅,要接触农民。边走边看边问,看到田埂上没种作物,就问为什么,有人告诉他,公社不让私人种,集体种也没有。耀邦同志马上找来公社负责人,明确田埂上私人可以种,也可以集体种,非常朴实,也非常联系群众。耀邦同志这种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里的作风,很好的教育了当地干部。

谈到60年党员干部的作风,常常有很多随时可以看到了榜样。这些榜样在极大的感染和激励群众,座谈中张和平同志谈到一幕感人的场影。那是在1968年,湘江突发大水,张和平当时住在市里的小东门。有一天小东门河堤在

摇晃,说明河堤将被大水冲刷有垮堤的危险。当时和平同志才十几岁。看到有个人大声对岸上的人群喊:“共产党员跳下去,挡住大水。”此时,呼拉拉的跟着跳下去不少人,硬是手挽手组成一道人墙,用身子挡住洪水对大堤的冲击,堤上人抓紧巩固大堤,相互配合。这一幕对和平同志包括岸上的群众以极大的震撼,也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口碑。

在部队工作过很长时间的刘声耀副主席在谈到处理部队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时,谈到了军民相互支持帮助的事情。当有时出现意外事故,在处理中总是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常常使矛盾得到很好的化解,始终保持了军民的鱼水关系。

机关退休的冯辉剑、寻春阳同志过去很长时期做统战工作。统战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是做特殊群众的工作,政策性非常强,不能有半点马虎。特别是在1978年至1990年,有大量的落实政策的事要做。他们常常没日没夜的工作,为了查清一个问题,深入到山区,找到一些当事人,反复核查核实。很好的把党的政策落实到了单位、家庭和个人头上,使这一群体的人心存感谢,为党争得了群众,为党的执政打下坚实的基础。

曾经在国土局工作过的谢晓明同志在座谈中也谈到,处处为群众作想,办事为群众利益考虑,事情就能办好,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谢晓明是2001年调入国土局担任主要领导。上班后他看到国土局4-7楼的楼道天天都挤满

了办事的人。有一次他碰到来办事的电化厂厂长,是来办一个国土证。转了一个圈还没办好。报告交给地产科,地产科签出意见请分管局长批,分管局长签出意见请局长审批,局长签出意见又打回地产科,都没有明确态度。谢晓明仔细看了报告,认为找地级科就可行,到地级科审核就办成了,这次事对谢晓明同志触动很大。他认为这样办事效率,群众来国土局办事这么难,是不应该的,应该为群众着想,予以改革。他到省厅汇报,省厅支持他的想法。他和局班子成员一起研究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建立一门式办事大厅,把相关业务科室抽出人员到办事厅建立窗口,实行一站式服务,让来办证、办手续的各单位和个人,都在办事大厅全部办好。为落实办事效率,还把局机关纪委、监察也设到窗口进行跟踪监督。这一办法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称道,也很好的提高了政府的形象。

三、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

毛主席说过:“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我们建国后,学习苏联模式,实行的计划经济本制,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对集中财力办大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久而久之这种统分统配、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统死了社会一切经济领域,严重的制约了企业和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党的全会上清楚的认识这一点,开始了社

会主义国家前所未有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确给社会带来阵痛,尤其对国有企业是一个冲击。过去国企全由国家包下来,什么都不愁。改革中,放开经济运行模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包括民营、外来资本、个体、股份制等等。国企一下子适应不了这种变化,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国家不再统购统销了,有的国企找不到市场,全年没有多少生产任务,职工的工资发放都成了问题。

机关退休的吴任奎同志就在这种情况下,从机关调到市轻工机械厂,担任主要领导。这个厂在南盘岭,当他进厂时,工人们没活干,一排排坐在车间外晒太阳,企业已是连年亏损。面对这种情况,吴任奎同志和厂班子成员一起,广泛听取意见,如何克服困难找出路。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干部都纷纷出主意。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开发新产品。他们瞄准了市场需要的一种塑料机械,但没有图样,他们就跑到和沙,找到这种实物进行测绘,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加班,赶出来,销售部门向外订合同,一大批订单纷至而来,车间里组织工人加班加点,行管干部也下到车间帮助解决各种问题,一派大会战的气氛。很快产品打开了销路,企业从没事做到任务压头,从而一举扭转了亏损,职工年收入比上年翻了番。

机关老同志,原副主席田书友同志,在座谈会上,谈到过去在企业工作的经历。深深体会到,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处处以身作则,紧紧依靠群众,才能团结大家,讲话才有威信,困难才

能克服,才能给党组织增添光彩。

田书友同志在电化厂工作了十多年,从技术人员到工厂一把手。在工厂他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走上领导岗位后更加严谨,当时他家没有安在工厂,上班是单职工,每天三餐饭到食堂里和工人们一起排队,打饭,住在单人宿舍三个人一间,厂里后勤部门认为田书友工作辛苦,要安排他一个单人间,以便休息,但他谢绝了。他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心里更踏实。那个年代,每家的用煤都十分紧张,都是凭计划供应。电化厂与煤矿有很多业务联系,出现搞几吨家庭用煤是很容易的事,但田老根本不开这口。企业生产每年要撤下来很多废电棒,买了放到家里做生火的燃料比煤都好。职工都希望从厂里买到这种废棒,田老定出制度,总是每次都买给最困难的职工。他自己一次都没买。电化厂是化工企业,车间都是三班倒,做零点班最苦,照理领导不需排零点班,因为大量事务以及市里、局里的会都是放在白天,但田老却主动带头排自己的零点班时间,从晚上12点到早晨8点,到车间和工人并肩工作。很好的鼓舞了一线工人。正是这种精神感动了全厂职工,大家信服他。企业出现困难时,经营发生亏损,都主动找原因出主意,使亏损很快扭转。1982年因工作需要,田老调到市里工作,离开时职工对田老依依不舍,多少年来田老也一直牵挂着电化厂的职工。这真是一种亲密无间的干群关系。

当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个重大的问题提

出来了,就是打破铁饭碗。建国后一直到80年代末,企业职工的分配一直实行的全国统一的标准工资制,又叫八级工资制。职工的工资定级、升级全凭工龄作依据。这是硬挂勾、一刀切、好操作。理论上说凭表现,凭贡献但很难执行。因为这种铁的工资制度在一个厂、一个地很难突破。我当时在省转机厂工作,后来叫五菱集团。记得1982年在加工车间当主任的时候,一个滚齿机的电路坏了。就安排车间一位58年进厂的电工师傅修,修了三天零件换了几种没修好,我只好叫来外车间一位70年进厂的年轻电工修的,半小时修好了。但工资收入70年的低于58年的,而且到了统一升级时,上面文件又是以工龄划线,工龄不够的升不了。因此这种铁工资制度,使职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局面。很多职工都想脱离一线,找各个关系各种理由到轻松的岗位,如守仓库、守传达室都高兴。一线的脏、苦、累的岗位留不住人。当时国家开始在国企实行一种新的工资制度试点,这种新的工资制度,叫岗位技能工资。湘潭市有五家企业列入试点。省轻机是其中一家。改革旧的工资制度,实行新的制度,这新的制度没有具体方案,只有原则意见,要在试点单位找出办法,找出经验。这是谈何容易的事。工资是涉及每个人的利益。非常敏感的事。几十年老工资制度虽然难以调动积极性,但习惯了。而要去触动这种制度,拿出一个全新办法,要让这种新制度不但做到平稳过度,还要真正调动积极性,特别是一向

一线职工，向技术含量高的岗位倾斜，是一件艰巨的改革任务。当时我们企业领导班子，反复研究，首先想到的是开门改革，决不能是厂领导说了算，发动职工参加。班子中明确我具体分管。因为我当时是分管劳资、人事的副厂长。在企业有一个很好的组织，就是职工代表大会，代表都是各个方面选出来。我想这项改革要充分的发挥这个组织的作用，发动代表积极参与。首先在代表中讲透改革的必要性，并通过他们到职工中发动，以充分打好思想基础，然后根据中央明确新工资制度的原则，结合工厂实际。制订出技能工资设定为每个人参加应知应会和技能考核，业绩考核来定夺方案，而更难的是岗位工资标准的制定，这一项占的比重也大，而企业的岗位细分起来有几百种，类似划岗也有几十种。而岗位工资的高低凭什么说了算，上级没具体意见，全靠企业结合自己实际去划分，这不能说是一个天大的难事，因为那个岗位都说我这是重要的都很辛苦。但站在公正立场上，大家又心知肚明，岗位的重要性、艰苦性对比之下的高低都还是有个谱。关键是如何组织职工都站在公正、公平立场上来制定各岗位的工资标准。因此在职代会上把这一任务交给代表们，发动他们到职工中广泛听取意见。然后将代表们分成三人一组，三人中有一线工人的、有机关干部的、有后勤人员。每个小组经过充分讨论对划出来的岗位进行排队打分。从高分岗位到低分岗位，拿出组里意见，再将各组意见汇总，通过职代会主席团讨论拿出了全厂所有岗位工

资初定标准。然后将初步方案向全厂职工张榜公布。公布后自然会有很大反映，再次由职工代表广泛听取意见，再作第二次讨论，成为工资改革第二榜，直至到第三榜定案，这样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工资改革的全过程。做到公开、公正，得到了职工的信任支持理解，新的工资制度，拉开了一、二、三线职工的工资差距，拉开了技能强与技能弱的差距，实行不到二个月，职工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在一线脏苦累的工人心头欢喜，干得有劲头了，在二、三线的职工有的本来是一线下来的，身体还好，主动向厂部报告要回一线，新工人进厂分配也争着到一线去，到技术含量高的岗位去。例如我们企业的各类机床，有普通的，也有数显、数控的。数显数控的技术含量明显高些，岗位工资也高些，年轻工人就愿意到这种岗位上去。全厂一种学技术、学知识的风气也随之形成。后来省劳动厅、市劳动局来企业验收我们的方案，一次就获得通过，并推举我们到全省作经验介绍。改革的实践再一次证明了依靠群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道理。

今天，我受支部委托，汇总了离退休老同志过去在各自经历中，实践群众路线的体会和经验，这里要说明的，一是时间关系，收集还不全面，有的老同志还没收集到；二是收集的这些故事，讲述中会有丢三落四，不能准确的表达他们发生的故事；三是讲到这些同志过去所取得的成绩，是他们忠实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结果。

老同志们回顾过去的工作，那时候

虽然任务重,压力大,条件艰苦,但心中却有一种幸福感、快乐感,而这种感受是来源于和群众心连心,可以说是情感交融,心中畅快。在这里讲句心理话,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吃点苦,甚至吃点亏,但给群众带来的是福,给党组织带来的是光彩!今天我们的物质条件好多了,时代交给的任务也不同了,但是党的群众路线不会变。习近平总书记说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

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今天汇集机关离退休老同志的群众路线实践的经历和体会,也希望能传承下去,我们相信也一定会传承下去,有党的坚强正确的领导,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党的事业一定会继往开来,取得更大的胜利。